

“捺印”与“刷印”小议

□ 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

最近读到了一篇文章，文中将“捺印”佛像也归入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中一并加以讨论，觉得这样容易混淆两者之间本质的区分，反而不易说明问题。

“捺”也者，具有按压、抑制、钤盖之义，历来御玺、关防、私章、雅印钤盖出来的印痕，都可称为捺印的成品，故简明通俗地讲，钤盖印章其实就是“捺印”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中印两国捺印技法都曾有过悠久的历史。

《周礼·地官·司徒下》曰“门关用符节，货贿用玺节，道路用旌节，皆有期以反节。”东汉郑玄注云：“玺节也者，今之印章也。”可知早在秦汉以前，“印章”已作为一种凭信而普遍行用于世了。在无纸的时代，印章则往封泥上钤盖，缣帛行用时则在缣帛上钤盖，纸张行用后便在纸制文件上按压施印了，这就是中国的“捺印”。

据有关专家推测，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，印度人已经开始使用砖制模戳将谷糠和树胶的混合物捺印在织物上，用以防染，然后用靛蓝进行染色，从而就可以获得蓝白图案的花布。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，模板印花产品在印度更进一步流行。到公元五至六世纪，也就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，印度又出现了捺印的佛像。而这个时期，也正是佛教传入中国最兴盛的一个历史阶段。在这个阶段，印度一带的高僧大德前赴后继，先后来中国传教、译经、说法，随之寺院、招提、兰若与日俱增。唐杜牧的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描绘的还只是南朝遗留寺院的概数，足见佛教在中国传播之兴盛。有的地方不仅是兴盛，而且乱象横生，遂招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、北周武帝宇文邕两次开展灭佛运动。如此频传的佛教盛况，产生于印度的捺印佛像之法也应该随之传入中土，并与中土久已固有的印章及肖形印法相结合，从而文明互鉴出中国的捺印之法。若情况真是这样，则“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，施于四众，每岁五驮无余”（唐冯贽《云仙杂记》卷五）的那块模板，就不一定是他从印度带回来的，而是中国自己制造的。

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的BD1471号《杂阿毗昙心论》，被鉴定为六朝（222—589）时期写本。这件经卷的背面有十尊捺印的佛菩萨像，经许多专家鉴定，认为这些佛菩萨像并非六朝时写经毕即钤盖上去的尊容，而是晚到唐代才捺印上去的形象，从而否认中国那时已有捺印的模板。退一万步说，若果真是唐代才捺印上去，那么唐代那块捺印模板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难道一定是从印度传过来或是哪位高僧带来的不行！

其实真正启迪刷印之法产生，进一步发明雕版印刷术，促进人类社会进一步文明者，既不是印度早期印花布的砖制模戳，也不是捺印佛菩萨像的小木戳，而应当是中国固有的印章“捺印”之法。前边说过了，中国印章起源很早，秦汉以后至于唐，发展的更快更好。唐朝的名家书手，将楷书楷法推向了极致，使印章的字体更贴近正规的书写字体，利于操刀镌刻。印章所刻文字皆是反字，钤盖出来的印痕才是有效的正字。多数印章四周多刻有边栏，以示

规整。所有这些都与雕版印刷术印制出来的书页版面，在技术上毫无二致。所不同者，就是印章的铸字模板面积不能过大，过大了，蘸墨便不易全面匀实，拿起来捺印下去也会因着力点不均匀，使印纸墨色深浅不一。遂迫使人们不得不扩大刻字模板，达到能镌刻树叶的水平，然后将模板翻转过来，摒弃蘸墨而改用敷墨，然后覆纸，再用软毛刷刷压所覆之纸，这就将印章蘸墨压印的弊端回避了，雕版印刷术也就破土而生了。

说起来似乎易如反掌，但就在这简单的反转之间，却孕育一个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创举——雕版印刷术的发明。这项伟大发明的价值和意义，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，有过如下的精彩议论：“古代世界的所有产品之中，论意义很少有比得上中国发明的纸张和印刷术的。两者都对世界文明的形成起过深刻的作用，对各处广大人民的精神和日常生活产生过久远的影响。纸张被证明是表达人类思想的最令人满意的书写材料，而如果再加上印刷术，一个人的思想就能飞跃时空的鸿沟传播给大众。总之，印刷出来的信息，使人类思想的知识模式产生了变革。而纸张又为传播思想提供了最经济最方便的手段。当然，除了书写、出版之外，纸张还有别的用途，它已经深入古今社会的各个角落，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。虽说近年来有了传播信息的其它媒介，但纸墨印刷的独特结合，仍然是根本、永久、轻便、世（也）许是当今最廉价易得的信息传播方法。”（英国李约瑟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第三十二章《纸和印刷》）

上面一段议论清楚地昭示，印章只在镌刻反字的技法上，于雕版印刷术有启迪作用，而在上墨、覆纸、刷印等印制技术方面，皆须社会人文需求的紧迫召唤和行内人的大胆革新，并不怕失败，敢于胜利。“捺印”不会直接产生雕版印刷术，而雕版印刷术则是新的伟大发明。

唐人皇族姓李，在高祖和太宗时期曾追认老子李耳为他们的鼻祖，尊道教为国教。但李世民在消除王世充势力过程中，曾获得少林武僧的大力支持，少林十三棍教唐王的故事，在民间曾经广泛流传。即皇帝位之后，对他们不仅大加封赏，并意识到战争的残酷及战死疆场将士的惨烈，遂令在过往的战场故地修建寺院，慰藉那些以身殉职的亡灵。这在客观上又促进了佛教的发展。有统计显示，到唐玄宗时，全国已有 5358 所寺院。武则天曾出家为尼，与佛教本有渊源。掌政后更利用情人冯小宝“与沙门十人伪撰《大云经》表上之，盛言神皇受命之事。制颁于天下。令诸州各置大云寺，总度僧千人……。天授元年（690）十一月二十九日，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”（清雍正燮《癸巳存稿》卷十二）。“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《大云经》四卷，表上之。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，当代唐为阎浮提主。制颁于天下”（宋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卷三十）。为武则天登上皇位造足了舆论，也为佛教兴盛发展加足了推力。到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（845）三月，尝“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数。大凡寺四千六百、兰若四万、僧尼二十六万五百”。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，至六月帝又敕曰“汉、魏已来，朝廷大政，必下公卿详议，博求理道，以尽群情”。遂于秋七月庚子，“敕并省天下佛寺……。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，有列圣尊容，便令移于寺内。其下州寺并废”。至八月则又曰“朕闻三代已前，未尝言佛，汉、魏之后像教寢兴，是由季时，传此异俗，因缘染习，蔓衍滋多。以至于蠹耗国风，而渐不觉；诱惑人意，而众益迷。泊于九州山原，两京城阙，僧徒日广，佛寺日崇。劳人力于土木之功，夺人利于金宝之饰，遗君亲于师资之际，违配偶于戒律之间。坏法害人，无逾此道。且一夫不田，有受其饥者；一妇不蚕，有受其寒者。今

天下僧尼，不可胜数，皆待农而食，待蚕而衣。寺宇招提，莫知纪极，皆云构藻饰，僭拟宫居。晋、宋、齐、梁，物力凋瘵，风俗浇诈，莫不由是而致也。况我高祖、太宗，以武定祸乱，以文理华夏，执此二柄，足以经邦，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，与我抗衡哉！贞观、开元，亦尝厘革，划除不尽，流衍转滋。朕博览前言，旁求舆议，弊之可革，断在不疑。而中外诚臣，协予至意，条疏至当，宜在必行。惩千古之蠹源，成百王之典法，济人利众，予何让焉。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馀所，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，收充两税户，拆招提、兰若四万馀所，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，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。隶僧尼属主客，显明外国之教”（五代刘昫《旧唐书》卷十八《唐武宗本纪》）。这种佛教兴盛发达的表象，必然催生出大量的善男信女，搭建起几千所官办寺院和无数私办的招提、兰若。

如此兴盛发达的佛教文化不仅吸收了难以计数的僧尼信徒，还拥有更多的世俗信众，更窝藏了不少作奸犯科的犯人。他们终日读经写经，乃至花钱买经供奉寺院、祈望来生立地成佛，并美其名曰作功德。这是一股包括皇帝在内的强大的社会力量，正是这种力量推动了佛经由手写向刷印的转变。

唐代世俗文化也改变了长期崇尚的门阀士族制度，前期除商业家庭出身不许考试科第外，其余社会上的农工家庭出身者，不论贫富，都可参加科举考试，走上仕途，改变自己乃至家庭的命运。遂令整个文化气氛十分兴旺。特别是诗歌的发展，更将整个社会带入了黄金时代。这种世俗的文化兴盛氛围，也呼唤新的“刷印”之法诞生，使书籍由抄传改进为“刷传”，从而也促使雕版印刷术应运而生。

“刷印”，也称为印刷。雕板印刷术、活字排版印刷术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，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全世界学术界的共同认知，只是雕板印刷术何时发明尚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，迄今仍在讨论中。近来，学术界一部分专家，将“捺印”“刷印”两种技法统称为“印刷术”，这不仅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，也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技法，使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的讨论更加迷失了方向。